

彝族社会历史 调查研究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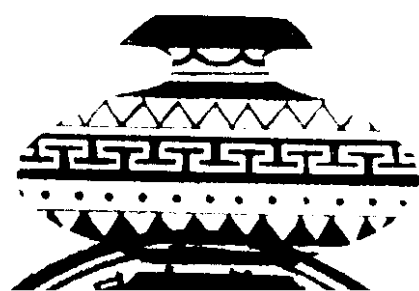
刘尧汉 著

民族出版社



彝族社会历史 调查研究文集

刘尧汉 著



民族出版社

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

刘尧汉 著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民族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1/2 字数：170千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800册 定价：0.55元

书号：11049·5

前 言

——忆范老等前辈对我的教诲

这本集子共搜集了十篇论文。这是建国三十年来我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点收获，从中也能看到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的过程。

我出生在云南省哀牢山区南华县的一个偏僻的彝村——沙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自幼读私塾，后来在大理中学就读。1943年，我作为本县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学习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的方法。在学习中认识到，社会学和民族学并不神秘，它在书本上，也在现实生活中，如村中彝老给我讲述的历史传说，我的反动家族的兴衰史，我所在村落的沧桑变化，等等，无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我耳闻目睹的历史变化，是更加真实、具体和生动的事件，这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也被许多学者忽视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我还深切感受到，上述活生生的历史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许多历史现象就在我们的眼前悄悄地消逝着，将被历史的洪流湮没了。抢救和记录这些事实是刻不容缓的，于是我留心搜集已经或正在消失的资料，开始了我的民族学调查的生涯。

我的调查是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主任费孝通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我的家乡——沙村的社会历史，后来根据这份材料，在张子毅副教授的指导下写成毕业论文——《沙村社区研究》。^①我当时对这份资料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理解，对其他一些调查也是如此。虽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其中的不少社会现象还是一个一个的疑团，埋藏在我的心中，这就是我解放前的状况。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又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记得我当时如饥似渴的攻读，边学习、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我所调查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些迷惑不解的疑团开始豁然开朗了。我决心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一次清理，有用的东西留存，无用的部分扬弃，不足的再去调查。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史学界的老前辈都伸出长者的手，给予我不少珍贵的教诲，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我赴哀牢山调查，翦伯赞教授特意写信对我说，郭老和他都想了解唐代南诏王室的族别问题，希望我到哀牢山南诏故乡调查时，留意此事。我下去以后，遵照他们的指教，深入查访，终于发现了有关的彝文谱系等资料，证明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彝族，纠正了南诏王族属于傣族的旧说，草成《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就此向翦老作了汇报，他殷切地祝贺我调查成功，鼓励我把南诏王族属于彝族的新证发表出来。

第二年，《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了。范老曾托人捎话给我，希望我把手头所存的其他稿件送给他看看。当时，我正在力图以马列主义观点修改《沙村社区研究》一文，目的有二：一、通过对自己反动家族的剖析，认识剥削阶级的罪恶；二、我的家族历史上是奴隶主，后

来演变为地主，这就为研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提供了一个活典型。因而写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②范老的审阅，给了我检验和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极好机会。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份手稿竟能得到范老热情洋溢的推荐。1956年5月24日，范老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在《光明日报》上介绍了我的文稿，他写到：

“近来看刘尧汉同志所著《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全稿约三万字，分前言、历史轮廓、经济概况、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剥削方式、经济外强制、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结语共九项。

刘尧汉先生在前言里说：‘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调查从1945年起到1954年止，历时十年，作过四次实地调查，最后一次是在1953年。在整理材料当中，还有不足或疑难的地方，并采用通信方式间接查询，不断作修正和补充。由于所根据的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因之，在叙述时就以解放前的情况为主，根据晚近的具体情况，逐步向上追寻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线索，寻究出它的发展规律来。’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象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

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下略）

其实，我只是作了一点资料搜集工作，用历史唯物的观点解释也还是一种尝试，由于范老的大力推荐，此文引起了不少反响。^③

事后，范老的秘书王忠同志又告诉我说，如果我还有好的调查手稿，范老还希望先睹为快。于是，我把清代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起义的调查材料寄去。那是1956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发出的，三天之后就邮回来了，退稿之速使我误以为范老嫌稿子太长，又不成篇，不愿翻阅。然而打开一看，稿子上留下多处眉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范老是仔仔细细看过了。这使我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接着还收到王忠同志的一封信，说范老认为我对李文学起义的调查是有价值的，特别是抢救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残稿，是对近代史的一个贡献，希望把它发表出来，供同志们参考。^④我即遵嘱交给《近代史资料》发表。^⑤

我当时还是一个在民族学和史学领域中学步的青年人，做了这么一点工作，不仅得到了范老的莫大关怀，也得到其他老前辈的亲切教诲，我认为这并不是关系我个人的事，而是：

第一，体现了党和老一辈学者对民族学的重视。

早在1955年，周总理就曾亲自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到民族地区去作实地调查，并提出开展大规模调查的设想。1956年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果然先后在全国十六个省区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主席和总理预见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某些民族地区保留的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农奴制残余必将迅速消失。而这些活材料，对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华民族及其中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无比珍贵，有必要及时抢救。当时大规模开展的调查，

就是以“抢救落后”为方针的。这次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宝贵资料的重要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必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

应该说，抢救落后，用存在于后进民族中的活的历史资料来研究人类的过去，这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早已提出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的。摩尔根终身致力于这一伟大的事业，用他称之为“印第安民族学”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早期历史的原貌”。（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2、5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说“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4页）我们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范老推荐我的未刊稿，正值全国即将开展民族调查之际。我想，范老的鼓励，一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二是希望人们更加重视现实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学资料去探索和认识历史。我从自己一点粗浅的探索中感到，运用这种方法，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文献之不足。

第二，体现了党和范老等老前辈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

我有幸得到范老等前辈的关注，所以早期的文稿都得顺利发表了。但一种新的看法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写的南诏族属的文章，刊物曾加了一个按语说：此新证“不能即作定论。”令人感动的是，郭老对这样的细节也注意到了。他老人家曾为此函询翦老（见《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尔后，郭老又在一次会上说：刊物给一个青年研究南诏的文章加按语，是不应该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郭老

等前辈是何等关心青年的成长,何等注意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同样,也说明了他们对来自现实的活资料是很重视的。⑥

综观自己几十年的治学道路,初步体会到:

首先,我在重视历史文献的同时,更侧重实际调查,这对民族学的研究至关重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记载甚少,即使在这些极为有限的记载中也多有失真。但是少数民族中有靠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口传史,在文化习俗中也保留许多原始落后的东西,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获得这些知识,它能为民族史和民族学提供许许多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史料。例如,中国的“十二兽”历法,中外不少学者主张西来说。可是,我们根据彝、黎等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的历法资料,则可以阐明它起源于我国原始时代的图腾崇拜。

其次,实地调查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是认识社会的主要途径。但我也不满足于单纯的实践,而认为只有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即把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把搜集到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因为我们研究历史,无非是依靠文献、考古和现实调查这三种资料。现实调查——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言也就是民族学调查——所获的资料,因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联,较前两种资料更为丰富、生动、充满活力,足以弥补前两种资料之不足。所以,范老把它形象地称为“山野妙龄女郎”,认为同她打交道往往是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得出新的结论的重要途径。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贬低前两种资料的重要性。考古发掘能再现最真实的古代、远古遗存;而丰富的文献典籍正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结晶;现实调查只有与前两者作比较研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要研究好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极需把三种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用范老的话说,就是既要

与死去的名门老太婆和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又要重视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这样的工作至今还是大有可为的。也许有人认为，解放三十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山野妙龄女郎呢？事实上，不仅在远离交通线的深山密林中和海岛边境上，还有着未开垦的处女地；即使已经调查过的地区，也还有许许多多的“妙龄女郎”在向我们招手哩！

此外，在民族学调查中，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给予重视是必要的，但其他方面也不可忽视。过去一度否定了民族学，把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视为禁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领域是最落后保守的方面，保留原始因素和民族传统也最多，彝族的许多宗教、迷信和节庆活动我都曾亲身参与过，知其底细，了解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历史。我写的有关图腾和葫芦崇拜的文章就是一例。我国著名史诗《诗经》中《大雅·緜》说“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这句诗，自东周孔丘删定到东汉由经学大师郑玄笺释以来，都不解其真义。而在我国许多民族中，却流传着各民族的祖先都出自一个大葫芦，因而彝、苗、布依、佯等许多民族普遍崇拜葫芦。有的把这一传说概括为“人从瓜出”。这岂不正是“緜緜瓜瓞，民之初生”的真义。本文集以“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为题，探讨了有关的问题。它说明，越是禁区，越可能饱藏着远古的历史。对于这些方面，我一直是重视的，即使在“四害”横行的时期，也坚持不声不响地广泛搜集，加以研究，现在可以公诸于世了。

现在编印这个集子，首先是想用自己的些微工作收获来纪念范文澜同志逝世十周年；另外也期望以此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工作。至于我的文章，只是探索之作，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1979年6月11日

注 释

- ① 此论文当时存云南大学图书馆。
- ② 此文原题为《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三期才改为今题（下简称《过渡》）。沙村的地主家族原系普姓彝族，后受大汉族主义思想影响，数典忘祖，认一刘姓汉族官绅为家门，遂改姓为刘。当《过渡》发表后，我寄了两分抽印本给范老，一分送他，一分送给他的秘书王忠同志。1959年7月8日收到王忠同志的复信说：“范文澜同志收到您的《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过程》的抽印本及第二次来信。他把您赠给我的一册书交给我，要我写回信代他向您致谢。这本书是我们最喜爱的一本好书，欣闻即将出单行本，十分高兴，范文澜同志早在其《待字闺中》时即以热心推荐，出版后必将受读者欢迎”。
- ③ 解放初期，我国史学界多习于单纯依靠文献资料，对于考古资料，特别是对于民族学资料重视不够。范老对拙稿《过渡》一文的推荐，引起了史学界对民族调查资料的广泛重视。如李亚农同志在其所著《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一书中引据《过渡》的资料后说：“拿中国现代的少数民族的情况来和古史作比较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是极正常、极普遍的研究方法，因为谁都知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其情况是大致相同的”。李亚农同志把沙村地主刘宇清总结其祖先统治经验的两篇短文视为“宝贵无比的两篇文献”，并对其史料价值给予肯定的评价。（《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95—997页）。
- ④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手稿，原藏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图书资料室，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 ⑤ 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第3期《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1963年第1期《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补》。
- ⑥ 另几位前辈对此《新证》也很重视，如：云南大学江应梁教授写了《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一文（见《云南大学学报》1959年9月号）说：“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刘尧汉同志到南诏故乡巍山去作调查，在哀牢山得到三份彝文家谱”，“从家谱看，这三家人都是南诏后裔”，“由此三家宗谱，更可以充分看出南诏蒙氏的族属关系”，“南诏王室不是傣族或傣语支中的任何一族，而是属于彝族系统的古代乌蛮”。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长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认为“唐代之南诏国虽有傩僰部族（彝族）参与其间，然其建国之蒙氏为爨夷（傣族）无疑”。（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民族学研究集刊》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一集）在看到《新证》一文后，马长寿先生于1960年到南诏故地作了一番实地复查，写了一本专著，其中说：“古时称为‘哀牢夷’，现代就是彝族。这三个家谱现在看来十分重要，在能够提出新的相反的证据以前，对于刘尧汉同志

的结论很难随便推翻的”。（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6页）。

近年来又有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到南诏故地查访，李绍明同志又发现了其他一些能证明南诏统治者出自彝族的证据，写出《巍山文物与南诏历史——南诏统治者系出彝族新证》一文。（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目 录

前言·····	1
——忆范老等前辈对我的教诲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	
——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 解放前的发展过程·····	10
太平天国革命的一支洪流·····	
——云南哀牢山彝族起义军的土地纲领和盐铁等经济措施·····	44
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	53
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	59
一、宗谱·····	60
二、灵台·····	70
三、巫画·····	72
“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	78
一、从彝族的原始图腾遗迹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 “十二兽”历法·····	79
二、“十二兽”历法起源于原始图腾的典型实例 ——哀牢山虎街山神庙纪日“十二兽”壁画·····	86
三、纪日“十二兽”壁画与彝文《母虎日历》碑·····	89
四、先秦史籍关于“十二兽”历法的零星记载·····	95
凉山彝族太阳历考释·····	100
从凉山彝族系谱看它的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	108

一、凉山彝族系谱的民族学意义	109
二、凉山彝族的主体是唐、宋、元“乌蛮——罗罗——落兰部落”的后裔	125
三、凉山彝族统治者黑彝和被统治者白彝的由来及曲诺的地位	137
四、凉山彝族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	150
五、凉山彝族按父系血缘聚居及其父系氏族制和氏族奴隶制	156
附录——凉山彝族系谱校订表释例	170
从小凉山白彝阿鲁基祖的发迹看奴隶制等级观念的反动性	197
羌戎、夏、彝同源小议——兼及汉族名称的由来	212
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	218
一、《诗经》“脤脤瓜瓞，民之初生”与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葫芦崇拜	218
二、中华民族原始先民崇拜葫芦的活标本——云南哀牢山彝族的“祖灵葫芦”	224
三、葫芦容器是陶容器的天然模型	229
四、葫芦容器、葫芦乐器与葫芦崇拜	233

前 言

——忆范老等前辈对我的教诲

这本集子共搜集了十篇论文。这是建国三十年来我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点收获，从中也能看到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的过程。

我出生在云南省哀牢山区南华县的一个偏僻的彝村——沙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自幼读私塾，后来在大理中学就读。1943年，我作为本县的第一个大学生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学习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的方法。在学习中认识到，社会学和民族学并不神秘，它在书本上，也在现实生活中，如村中彝老给我讲述的历史传说，我的反动家族的兴衰史，我所在村落的沧桑变化，等等，无不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我耳闻目睹的历史变化，是更加真实、具体和生动的事件，这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也被许多学者忽视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我还深切感受到，上述活生生的历史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许多历史现象就在我们的眼前悄悄地消逝着，将被历史的洪流湮没了。抢救和记录这些事实是刻不容缓的，于是我留心搜集已经或正在消失的资料，开始了我的民族学调查的生涯。

我的调查是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

系主任费孝通教授的指导下，调查了我的家乡——沙村的社会历史，后来根据这份材料，在张子毅副教授的指导下写成毕业论文——《沙村社区研究》。^①我当时对这份资料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理解，对其他一些调查也是如此。虽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其中的不少社会现象还是一个一个的疑团，埋藏在我的心中，这就是我解放前的状况。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又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记得我当时如饥似渴的攻读，边学习、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我所调查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些迷惑不解的疑团开始豁然开朗了。我决心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一次清理，有用的东西留存，无用的部分扬弃，不足的再去调查。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多史学界的老前辈都伸出长者的手，给予我不少珍贵的教诲，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我赴哀牢山调查，翦伯赞教授特意写信对我说，郭老和他都想了解唐代南诏王室的族别问题，希望我到哀牢山南诏故乡调查时，留意此事。我下去以后，遵照他们的指教，深入查访，终于发现了有关的彝文谱系等资料，证明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彝族，纠正了南诏王族属于傣族的旧说，草成《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就此向翦老作了汇报，他殷切地祝贺我调查成功，鼓励我把南诏王族属于彝族的新证发表出来。

第二年，《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了。范老曾托人捎话给我，希望我把手头所存的其他稿件送给他看看。当时，我正在力图以马列主义观点修改《沙村社区研究》一文，目的有二：一、通过对自己反动家族的剖析，认识剥削阶级的罪恶；二、我的家族历史上是奴隶主，后

来演变为地主，这就为研究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提供了一个活典型。因而写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② 范老的审阅，给了我检验和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极好机会。

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份手稿竟能得到范老热情洋溢的推荐。1956年5月24日，范老以《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为题，在《光明日报》上介绍了我的文稿，他写到：

“近来看到刘尧汉同志所著《一个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之一例》。全稿约三万字，分前言、历史轮廓、经济概况、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剥削方式、经济外强制、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结语共九项。

刘尧汉先生在前言里说：‘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几全是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调查从1945年起到1954年止，历时十年，作过四次实地调查，最后一次是在1953年。在整理材料当中，还有不足或疑难的地方，并采用通信方式间接查询，不断作修正和补充。由于所根据的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因之，在叙述时就以解放前的情况为主，根据晚近的具体情况，逐步向上追寻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线索，寻究出它的发展规律来。’我觉得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采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

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象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的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邪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太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她介绍一